

薇拉·凯瑟和杰克·伦敦 作品中的性别与风景

李莉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美国文化中存在着将风景女性化的传统。男性是风景的凝视者,风景被女性化。20世纪初至30年代,在美国社会从荒野到文明、从前现代到现代化的历史转型期,薇拉·凯瑟和杰克·伦敦大胆挑战美国传统风景观。凯瑟的女主人公是内布拉斯加草原精神的象征,女性与风景相互融合、相互成就。伦敦的后期作品塑造自立自强的女性,提倡平等的两性关系和人地关系。两位作家的风景叙事都具有国家意义,呈现鲜明的美国地域特征和美学特征,他们共同理想化风景观是人与去性别化风景和睦共处。

关键词:性别化风景;薇拉·凯瑟;杰克·伦敦;人地关系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2)04-0048-09

0 引言

2000年,著名的杂志《纽约客》(*The New Yorker*)刊登了一幅卡通画,画面上一对男女旅行者俯瞰脚下的山林,提出一个令人反思的问题,“请问,风景跟性别有何关系?”“性别化风景”(gendered landscape)即风景与性别批评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贾尼斯·蒙克指出关注风景研究中的性别问题存在障碍,“在物质景观中辨别更显而易见的阶级、种族或者族裔表征并非难事……但是性别呢?”(Monk, 1992:2)。究其原因,一是西方文化传统决定了风景研究一向以男性,尤其是白人男性为主导,女性的风景化和风景的女性化被视为当然,女性景观被忽略;二是自然是人类的栖息地,两性看待风景的方式隐藏着复杂的性别权力关系。

无论是在文化地理发展的哪个阶段,男性是风景的凝视者,风景被女性化,是男性观察、评论的对象。正如温迪·达比所言:“在某种程度上风景一直是男性的领域。大多数地形学方面的工作反映出男性和军事性的眼光。游览欧洲大陆,欣赏沿途风景的人最初大多是男性;艺术市场由男性主宰,他们是风景画派的资助人或是生产者;争论风景的范畴及其对人类身心影响的美学家是男性;早期风景旅游的倡导者也是男性;有关徒步旅行和登山活动的讨论也反映出一种性别化了的风景区象征主义;风景,无论是再现的还是实际的,都是身份的附属物,正如妻子、情人和女儿们是拥有土地并管理国家的男人的附属物一样。”(达比,2018:2)科斯格罗夫认为风景的意识形态体现在其与父权制话语的合谋上,“文化被界定为‘男性’的属性,而自然则属于‘女性’的属性……这些‘女性特质’表现为非理性、任性和野性,有时也感性、温柔和驯服——但自然屈服于男性理性和独创性的控制力,则是一个一贯的比喻”(科斯格罗夫,2009:

收稿日期:2022-04-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美国文学地理的文史考证与学科建构”(16ZDA19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莉,女,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研究。

引用格式:李莉.薇拉·凯瑟和杰克·伦敦作品中的性别与风景[J].外国语文,2022(4):48-56.

374-375)。

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作家安妮特·克洛德尼在《地势:美国生活与文学中作为经验与历史的隐喻》(*The Lay of the Land: Metaphor as Experience and History in American Life and Letters*, 1975)和《她面前的土地》(*The Land Before Her: Fantasy and Experience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s, 1630—1860*, 1986)中批评了环境叙事的主流视角是白人男性,土地描写被女性化,以及女性如何以花园作为自己的风景隐喻对抗男性话语。1999年的学术会议“性别化风景:过去的地方与空间跨学科研究”以及2005年出版的论文集汇集学者们从多角度探讨女性和男性在日常生活中对风景的体验和感受,探索风景与性别研究的新思维(Dowler, et al., 2005: 1-2)。

那么,以男性为主导的美国风景文化传统在20世纪前30年是否发生新变化?本文拟分析凯瑟和同时代的杰克·伦敦20世纪初到30年代作品中的风景叙事,揭示两性风景书写中的新型人地关系和共同的国家属性。

1 薇拉·凯瑟的风景观

玛格丽特·菲茨西蒙斯指出人文地理学是围绕自然和文化的区别构建的(Rose, 1993: 73),在地理学话语中,风景被女性化,女性和风景皆为男性眼中的他者。吉莉安·罗斯对大男子主义地理学进行了后结构主义的批评后指出,地理学传统表现为“一种大男子主义凝视景观(Masculine Gaze)方式,这类凝视具有二元性,既有观者支配与掌握的主动性,也包括作为女性而建造的‘自然化的’景观的被动性;既有研究者所宣称的科学理性,也隐含了被压制的视觉愉悦”(向岚麟等,2010:10-11)。

20世纪初,著名的女性地域主义作家薇拉·凯瑟对男性主导的风景文化传统大胆提出挑战。凯瑟从九岁起随全家搬到内布拉斯加州的红云镇(Red Cloud),辽阔、单调、野性的内布拉斯加大草原被她赋予“粗犷质朴的风景以美和神话的力量”(陈榕,2016: 21)。历经1880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进步时代”、美国边疆热终结与现代化兴起的转型时代,凯瑟的草原景观揭示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等矛盾交织的真实历史面貌。更值得关注的是,“草原三部曲”《啊,拓荒者!》(*O Pioneers*, 1913)、《云雀之歌》(*The Song of the Lark*, 1915)和《我的安东妮亚》(*My Ántonia*, 1918)里,凯瑟以内布拉斯加草原景观为蓝本,塑造自由勇敢、挑战传统的女性,改写女性被边缘化的文学形象,从女性角度探讨人地关系、两性关系、社会变革等社会问题。

西部边疆理论家佛利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认为美国西部是在欧洲男性、机构和父权观念基础上建立的,女人被要求只能接受和服从(Kolodny, 1984: 3-4)。从17世纪中期开始,美国女性不得不接受被排斥在美国亚当神话之外的身份,在丈夫和父亲怀疑的目光中,“为摆脱被控心理,女性开始在风景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为自己保留了园艺语言”(Kolodny, 1984: xiii),把女性空间从室内扩展到户外花园,建立起属于女性自己的乐园。

《啊,拓荒者!》是美国西部边疆开发史的缩影。凯瑟通过瑞典的移民后代亚历山德拉聚焦了女性与草原风景,展现男性与女性对土地的不同态度,揭示女性的成长史与区域风景的变化呈现高度一致性。亚历山德拉首先继承了母亲伯格森太太留下的花园,花园是女性特有的风景隐喻,由女性自主设计、耕耘,辛勤付出后的收获,让女性收获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满足,感动于自然的美,感动于人的创造力。伯格森太太是一名传统的家庭主妇,种满瓜果蔬菜和鲜花的园子是她生活的核心。在属于自己的花园里辛勤劳作,将收获的瓜果制作成各种果酱的过程赋予伯格森太太极大的勇气和力量度过艰苦、寂寞的异国

生活,传承故乡的传统。“这个家在精神上没有解体,没有出现那种得过且过的风气,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为坚持在新环境中恢复她旧时的生活规律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凯瑟,2006:169)成功后的亚历山德拉成为“分界线”最著名的女农庄主,把母亲的花园打理得井井有条。除母亲的花园外,亚历山德拉还继承了母亲的厨房,雇佣的三个瑞典姑娘在厨房里摆放各种果酱和腌菜,让人想起伯格森太太和欧洲大陆的家乡。弗吉尼亚·伍尔夫指出,食物很少成为小说的主要话题,原因是男性文化通常把居家活动视为微不足道的女人之事。伍尔夫为了改变这些传统,把准备和制作食物变成自己文学作品中的重要话题,在凯瑟的作品里准备和制作食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Westling,1996:96-97)。

母亲的花园让亚历山德拉获得一片属于自己的乐土,感受自然的美和故土的味道,美国内布拉斯加大草原则给她提供成就更大梦想的社会空间。19岁的亚历山德拉一出现就与众不同:狂风怒号、雪花纷飞的内布拉斯加草原,灰蒙、低矮的汉努威小镇,凛冽寒风中摇摆的低矮草房与坚定果敢的女主人公形成巨大反差。她高大健壮,目标明确,做事果断,强烈的镜头感突显亚历山德拉与众不同的气质和个性,既热情、阳光又果断、理性,兼具女性和男性气质,与周围的风景形成独特而神秘的联系。

亚历山德拉在凯瑟笔下,不是被动、懦弱、依赖男性的边疆传统女性,而是勇士,是英雄,她的果断、远见和过人的管理才能让她成为父亲托付的土地的继承人。她深爱、敬重脚下的土地,感动于土地给人类生存提供的一切,“她觉得这土地太美了,富饶、茁壮、光辉灿烂。她的眼睛如痴如醉地饱览着这广阔无垠的土地,直到泪水模糊了视线……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从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心里开始的”(凯瑟,2006:186)。她的坚持和努力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作为最富有的农场主,她尽管有豪华舒适的家宅,但在内心,“真正的住宅是那辽阔的旷野,只有在地里她才最能充分表现自己”(凯瑟,2006:194)。亚历山德拉最快乐的时光是她的身体和灵魂与大地风景融入一体的时刻:“那是她觉得自己和周围平坦、褐色的世界特别接近的日子,好像那土壤中的活泼生机融入了自己的身体。”(凯瑟,2006:249)同样,《我的安东妮亚》的女主人公安东妮亚也是土地的象征,她“与土地结为一体……仿佛她就诞生自土地”(Rosowski,1987:88)。凯瑟笔下的风景摆脱了性别化传统,女性与风景达到身心的同一性。独立的女性进入社会空间,与男性一样成为风景的守护者和拥有者。女性与风景形成相互珍视、相互成就的人地关系。

另一方面,凯瑟揭示了父权思想影响下男性对于女性、风景和土地的落后理念。亚历山德拉的两个弟弟奥斯卡和罗虽然依靠姐姐的睿智和苦心经营才分得土地建立自己的农场,但他们坚持只有男性才是土地的主人。亚历山德拉的好友邻居卡尔从城市来访时,他们担心姐姐如果跟卡尔结婚,土地的所有权旁落,一致坚持家庭财产都是属于男人的。对此,亚历山德拉反驳道,根据美国法律,无论婚前还是婚后,女性的财产完全由自己拥有和支配,亚历山德拉表达了美国新女性的权力主张。

《啊,拓荒者!》的时代背景是19世纪后30年代到20世纪初,工业化、现代化的影响日渐增强,热爱、依赖自然风景的亚历山德拉选择同祖先一样,以大草原为永远的栖息地。拓荒初期,内布拉斯加草原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很多新移民选择卖掉土地进入城市。有远见的亚历山德拉对家乡产生更深层次的“恋地情结”,“她对这乡土有了新的认识,几乎感到同它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她从未意识到这乡土对她多重要……她感到未来正在那蜿蜒的、粗野的土岗下躁动着”(凯瑟,2006:189)。她热爱粗犷、辽阔的草原风景,更从与大自然朝夕相处的岁月中获得力量和归属感,“思索大自然的行动总是给她以力量,每当她想到支配着这行动的规律时,她个人就有一种安全感”(凯瑟,2006:189)。

凯瑟塑造的亚历山德拉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写了女性的传统社会角色和从属地位,创造了女性神话。亚历山德拉不愧为草原精神的象征,女性与自然风景之间互敬互动的亲密关系在亚历山德拉的身上得以

完美结合,构成美国文学中新的风景观。

2 杰克·伦敦的风景观

凯瑟同时代的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福克纳、杰克·伦敦、托马斯·沃尔夫等著名男作家大多是男性中心主义者。女学者尼娜·贝姆指出,进入 20 世纪后,美国神话变成毫无希望的追求和梦想,并引用《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叙事者尼克的结束语概括美国梦想的破灭:“那些可有可无的别墅便慢慢溶化在月色之中了,直到我渐渐意识到,这就是那座当年让那些荷兰水手的眼睛大放异彩的古老海岛——新世界的一块清新、翠绿的乳胸……人类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梦想……人类在历史上最后一次面对面地用某种与他的能耐相称的眼光欣赏着这片蔚为壮观的美景。”(菲茨杰拉德,2017:239)菲茨杰拉德甚至把盖茨比追求美国神话、实现梦想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黛西。贝姆批评道,在许多男作家作品中,无论是束缚、阻碍甚至破坏个人发展的人类社会,还是给人带来希望、精神慰藉的风景都无一例外地与女性有关,这种性别化的描述和性别界定包含厌女症情结(Baym,1981:133)。男性作家把自然母亲的怀抱当作逃避现实的手段:“风景被赋予女性特征,如同社会一样;然而,在充满威胁和破坏力的社会,风景却是顺从的,并给予人们帮助。风景同时具有纯洁无瑕的新娘和没有任何威胁的母亲属性;风景的女性特征是通过男性的视角被表述的:英雄问道,自然能为我做什么,给予我什么……美国神话中的英雄们把自然看作爱人和养育自己的地方,希望通过自然满足他们所有的欲望,包括控制欲和权力。”(Baym,1981:135)

海明威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海明威少时起就热衷于边疆男性特有的打猎、钓鱼、野营,密歇根州的大森林给他留下最深的记忆,“硬汉形象”是其作品中的主流形象。海明威如人文地理学家一样,关注地方、地理、空间主题,意在揭示风景、地方、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Godfrey,2016:6-8)。此外,海明威的风景、地理美学观还有明显的个人和男性特征。小说集《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1925)里收集了15篇尼克系列故事,尼克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空间中寻找妥协和平衡,一是积极活跃、带有威胁力的女性构成的社会陷阱,另一个是温柔、被动的女性化自然风景(Westling,1996:93)。然而,在风景描写最精彩、最细腻的短篇《大双心河》中,女性被海明威有意排除在男人的视野之外,自然风景只是男性证明自己、拯救自己的背景而已。一战归来的尼克回到熟悉的家乡,来到双心河边钓鱼,海明威这样评论“钓鱼”：“这种事让人背疼、肌腱紧张,是男人们才能做的事情……你会感觉到一种心灵的涤荡。”(周峰,2020:233)风景描写中不仅没有女人出现,甚至连尼克第三次钓上来的两条大鳟鱼都是雄的。海明威作品中的“渔”行为体现西方文化中的男性气概,是构建男子汉身份的重要手段。尼克独立面对自然、独自钓鱼的行为就是证明男子汉气概,实现自我拯救的手段(周峰,2020:217)。

与海明威及其他男作家不同,杰克·伦敦的风景观在文学生涯后期发生巨变。总体上,伦敦的作品包含两种对立的风景思想——“北部育空地区的故事描绘了个人与冷酷无情的风景之间的矛盾,而加利福尼亚系列小说的主题则是美西具有治愈作用的空间带来浪漫氛围的转变”(Campell,2001:60)。加利福尼亚州是杰克·伦敦文学风景的发源地,“不管他在世界上哪个地方漫游(从克朗代克河辽阔冰原到温暖宜人的南海热带岛屿),这里都是杰克·伦敦最喜欢的地方,思念最深的地方,最让他感到安心的地方……1903年,他与这片土地开始了恋情,直到13年后去世”(Jones,1991)。伦敦在索诺马峡谷购买了1400英亩丘陵牧区,索诺马在印第安传说中是“多月”的意思,所以该地区又叫“月亮谷”,因杰克·伦敦而著名。

伦敦早期笔下的风景是从未开化的荒野,是自然王国。他的冒险经历和文学作品体现了 20 世纪初

盛行美国的冒险主义和扩张主义。受尼采的种族优越论影响,伦敦早期作品中女人大多处于从属地位:被动、顺从、软弱,主人公是风景的主人和征服者——男人,女性与风景都是男人凝视下的“他者”(明特,2009:60-61)。然而,伦敦后期的田园三部曲《毒日头》(*Burning Daylight*, 1910)、《月亮谷》(*The Valley of the Moon*, 1913)、《大房子里的小妇人》(*The Little Lady of the Big House*, 1916)的女性观和风景观发生转变。以《月亮谷》为例,伦敦通过女主人公撒克逊表达他对白人男权持高度批评的态度,“她的价值观和力量使她能欣然而健康地战胜她所在时代的陈规陋习”(瑞斯曼,1997:32),她的独立和与男性平等的形象揭示作家伦敦进步的两性观,男女主人公寻找“月亮谷”所代表的新世界、新伊甸园的朝圣之旅象征着作家“在田园式土地上寻求自由和集体的美国传统观念”(瑞斯曼,1997:34)。

《月亮谷》与凯瑟的《啊,拓荒者!》同时发表于1913年,故事也发生在美国拓荒时代刚刚结束,工业化如火如荼的历史转型期。不同于凯瑟,伦敦的小说同时关注了城市和乡村风景,女主人公和她的丈夫比利·罗伯兹寻找共同家园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他们是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劳动者,遭遇严重的生存危机和阶级矛盾;第二阶段他们选择逃离城市,去乡村寻找理想的归属。

都市风景对奥克兰市的熨衣女工撒克逊·布朗来说意味着超时工作的机器轰鸣、简陋气闷的洗衣房,丑陋、肮脏、摇晃的工舍,贫困、单调的生活,还有女人无法摆脱的宿命,“到时你也将像傻瓜似的找个人嫁出去……小崽子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伦敦,2014:6)。对马车夫兼拳击手的比利来说,职业拳击场是冷酷无情、弱肉强食的都市缩影,背后的美国社会毫无公平而言,女性的地位尤其低下:“妇女的身上,有最美好的品质,他们却像马一样,被买来卖去。”(伦敦,2014:57)都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资本快速积累的同时,不可避免造成人性异化、阶级分化和社会伦理恶化。撒克逊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要生活在城市?为什么世道会变化?为什么过去可以丰衣足食,现在的供给则如此匮乏”(伦敦,2014:100-101)?罢工失败后酗酒的比利因打人入牢,走投无路的撒克逊从海景找到慰藉:自然界是一个理性、自由的世界,一个没有欺诈、强权、平等的世界,潮起潮落、日出日落都遵循自然规律,“自然世界一切都那样地井然、理智、慈善。可是这个人间!人间的一切都那样地紊乱、疯狂、可怖”(伦敦,2014:154)。作家通过撒克逊深刻反思异化的城市景观给身处社会中下层的美国民众带来的物质匮乏和精神的压抑与绝望。

撒克逊寻找理想家园的念头从第一次与比利去峡谷约会时就已萌发。夏日的树林、泉水、花丛中的蜜蜂让撒克逊发出感慨,“眼前的美景让我产生出终老乡间的念头。我从没在乡间生活过……这里没有阴谋,没有诡计,没有欺骗,也没有谎言”(伦敦,2014:59)。乡间的自然景观绚丽多彩,纯粹、洁净、简单的乡村生活让两个年轻人产生回归乡村生活的念头。比利出狱后的一场电影最终促成他们做出到乡村去的决定,恬静的农庄画面让撒克逊找到心之所向:近景的院子里家禽和谐觅食,阳光自信的年轻姑娘和小伙子甜甜蜜蜜,中景是农田、谷仓、马场,远景是翠绿的群山和碧蓝的天空。福克纳在《熊》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人只有回归自然,回归荒野,才能成就生存与内心的平衡,因为自然是心灵回归的殿堂(纪秀明,2021:37)。

跨越北加利福尼亚州寻找家园的过程是撒克逊和比利的启蒙之旅,“他们的天路历程——像所有的朝圣者一样——穿越物质空间抵达一个心灵之地,他们祖先的历史根基”(Campell,2001:67)。他们结识了不同朋友,居住在卡尔米尔的知识分子群体让他们对美国社会本质有了更多理解,尤其是拓荒时代结束后不同种族、国家的移民对于土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邂逅的作家杰克·奥斯汀(伦敦本人化身)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邪恶的时代,这种对土地大规模的掠夺性的耕作行为是当今美国全国性的罪行。”(伦敦,2014:254)在索诺玛山的月亮谷,撒克逊终于找到属于“她的土地”、她的家园,右前方是

陡峭山岭,山间是苍翠的深谷,山脚底是一座座绵延起伏的果园和葡萄园”(伦敦,2014:290)。

在以《月亮谷》为代表的后期作品中,伦敦有意识地探讨人与自然风景的新型关系。独立自强的撒克逊是新女性的典范,她热爱自然风景,对自然界的公平、仁慈深信不疑,认为人类只要付出努力,善待自然,就会得到自然的丰厚回馈,自然就能成为人类理想的归宿和乐土。

3 风景叙事的国家意义

关于风景的文化意义,恩雅·亨森总结为“风景之于‘土地’的差异是,风景隐含广阔的视野——从某一特权位置所见,被拥有者/观看者/叙事者在对风景的接受度进行预设前提下,进行挑选抑或改造后的景色”(Henson, 2011:225)。一方面,风景与地方关联在一起,是某一地域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风景强调人的主体性,文学风景是作家个体通过不同方式感受、体验风景后,对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互动关系的表征。风景除了个体差异外,美国文学传统中的男权思想不可避免造成风景的性别化差异。然而不可否认,差异背后是风景叙事在国家维度上的共同点。凯瑟和伦敦的风景叙事具有以下共同点:风景描写都具有鲜明的美国地域特征和美学特征;社会转型期乡村风景与城市景观的矛盾冲突促使人们做出选择;理想化的风景超越性别,人与风景相互依存、相互成就。

凯瑟是美国最伟大的乡土文学作家之一,她的草原风景叙事既有鲜明的地域特点,表现女性与地方、女性与风景(自然)的同一性,又再现田园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艺术手法上,凯瑟的内布拉斯加风景描写诠释了西部边疆风景的美学特征。《啊,拓荒者!》开篇的汉努威小镇呈现荒野面貌:低矮简陋的房子在狂风暴雪中战栗,脚下是冰冷、灰色的草原,头顶是昏暗的天空。《我的安东妮亚》里初到黑鹰镇的吉姆看到同样的景色,祖父家北面是一望无际的红色牧草,风一吹过好像翻滚的大海一样,“几里路远都是红铜色的草,沐浴在比一年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的阳光之下。金黄色的玉米田成了金红色,干草堆变成玫瑰红,投下长长的影子。整个大草原像一片燃烧着,然而烧不尽的灌木林”(凯瑟,1998:28)。两部小说中,早期的草原是“崇高美”风景化身,自然是野性的,风景是“荒野的、崎岖的、超越人们想象的、广阔无垠的”(达比,2018:53)。

荒蛮的大草原在16年后被改造为人口稠密、收成满溢的沃土,呈现一幅独特的美国内布拉斯加农业风景画:麦地和玉米地形成深浅相间的绿色、褐色、黄色格子,农家房子被涂上鲜亮的五颜六色,仓房是鲜艳的红色,风信标是闪亮的金黄色(凯瑟,2006:190)。丰收的农业景观是对劳动者的礼赞,这就是风景美学意义上的“秀美”——“被开垦的、平滑的、安静的、和谐多样的渐进”(达比,2018:53)。凯瑟作品中既歌颂了原始草原的崇高美,又赞美了农业景观的秀美,两种“如画美”风景是西部拓疆史的见证,是拓荒者改造自然、把荒地变为良田的奇迹见证,是美国拓荒精神的体现,是风景的国家意义和美学价值的诠释。

两部小说中的拓荒者不论男女都热爱自己的家乡。《我的安东妮亚》的叙事者吉姆多年后乘坐火车穿越乡村和城镇,回忆起内布拉斯加小镇故乡,故乡的农田、特有的四季,甚至草原上刺骨的寒风都让他找到熟悉、独特的家乡感觉。《啊,拓荒者!》中有这样的场面:“那是一个宁静的夏夜,干草的芬芳沁人心脾,牧场上传来笑声和嬉水声。当月亮从光秃秃的草原边缘升起的时候,池塘像磨光了的金属片一样闪闪发光,她(亚历山德拉)望见男孩子们像一道白光一样的身体在池边跑着或者跳进水里去。”(凯瑟,2006:177)凯瑟第一次用男性的身体隐喻风景,消弭了风景的性别化传统,两性与自然风景形成融洽、亲密的关系。

在《教授的住宅》(*The Professor's House*, 1925)里,凯瑟也从男性的视角揭示风景对男性的意义。圣彼得教授坐在丑陋、闷热的房子里,透过窗户看到“远处地平线上一片雾茫茫蔓延不断的蓝色区域——他童年记忆中的内陆湖,密西根湖”(Cather, 1925:29)和窗外“已经成为他生活的抚慰”(Cather, 1925:5)的花园。风景代表着圣彼得人生中最美好的快乐时光,花园是重建的伊甸园,是他情感的避难所,让他重拾梦想,找到逃脱虚伪现实生活的方法,获得安全感和内心的平静(孙晓青,2015:35)。

除了关注两性与风景的关系外,凯瑟还揭示了现代城市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导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疏离感。在《啊,拓荒者!》里,离开家乡20年后的卡尔感叹离开家乡土地、失去家的无根感觉,“在那些城市里有着千千万万像我这样到处滚动的石头。我们都是差不多的;我们没有任何联系,没有熟人,一无所有……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地盘,自己的人”(凯瑟,2006:212)。《我的安东妮亚》里的吉姆·蒂妮、丽娜三人后来都选择在大都市生活,虽然拥有了更舒适的物质生活,但他们都没有真正家的感觉。凯瑟表达了现代美国人对渐行渐远的田园故乡的追思怀旧之情。然而,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风景叙事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她希望美国人做出自己的选择。三部曲中亚历山德拉选择留在家乡的草原,《云雀之歌》里的西娅·克朗伯格为了成为歌唱家离开小镇来到纽约实现梦想,第三部里的安东妮亚经历从草原到城市再回到草原的故事。总之,在继承传统、坚守地域性和美国拓荒精神基础上,凯瑟的女性人物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理性、物质的现代性,并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

杰克·伦敦在《月亮谷》里首先展现了以奥克兰市为代表的美国城市风景特征,资本家肆意欺压、剥削工人阶级,城市空间的差异性、阶级性给普通民众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危机,社会风气逐渐恶化,伦理道德沦丧。现代城市沦为利益至上、人情冷漠的精神荒野,以一个客体化的存在阻止普通的美国人获得真正的栖息之地,使大多数人沦为城市里的陌生人。伦敦通过撒克逊和比利在城市的遭遇揭露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风景的政治性,批判城市景观的非正义性使劳动人民在城市空间中的公正公平权力难以得到保障。

物质发达、精神冷漠的城市景观迫使撒克逊和比利追随祖先的脚步,到广袤自由的乡村寻找新的机遇。加利福尼亚的独特海景在绝望无助的撒克逊心里燃起新的希望,“海湾那边是隐隐约约的圣弗兰西斯科……太阳是灿烂的,风是暖和的,那带有强烈咸味的空气吸起来也十分舒适。还有那白云朵朵的蓝天也是美好的”(伦敦,2014:154)。撒克逊和比利的寻找家园之旅从北到南穿越加利福尼亚州,目睹了美国西海岸多种地形地貌。小说中有大量风景描写,既有美西的河海、峡谷、山脉、丛林、草原、沙漠等未经人工染指的纯天然风光,也有各式农庄、果园、牧场、村镇等人类开发后的景观描绘。最终,索诺玛山的峡谷景色之美深深打动了他们,“月亮谷”成为撒克逊和比利苦苦寻找了三年多梦寐以求的家园:“峡谷的景色美极了。一片片红杉树高大挺拔,山岭远端的三座崎岖小山上云杉林和栎树林密密丛丛……他们驶向山谷。路边的溪水在枫树和赤杨下潺潺流去。黄昏的霞光透过天空上的积云,把峡谷染成了绯红。这时,枝繁叶茂的淡红色石楠树和深红色熊果树如火烧一般。空气中飘浮着月桂的芳香。”(伦敦,2014:291)小说中既有作家对美国乡村风景和田园生活的歌颂和怀旧,也有对20世纪初美国都市风景的批评和反思。

索诺玛山谷的自然风景既是伦敦自己家宅的真实描写,也是小说中撒克逊夫妇的理想乐土。细致的风景描写表现了作家对家乡风光的热爱,对宁静乡村生活的赞颂和追求。伦敦自己多年生活游历、深刻思考后做出回归乡村,回归自然的选择。他设计小说中男女主人放弃物质至上的城市风景,回归简朴宁静的田园生活。伦敦的风景观和人地关系呈现新面貌。

4 结语

20 世纪初至 30 年代美国社会经历了从荒野到文明,从前现代到现代化的历史转型过程,关注这一时期男女作家作品中的风景叙事具有特殊的文化和历史意义。凯瑟以内布拉斯加草原为蓝本,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被刻画为西部边疆英雄,美国拓荒精神的化身,打破了西方传统文化中男性英雄形象,改写了西方文学经典中性别化英雄的旧俗(Quawas, 2021:237-250)。与同时代的男作家相比,凯瑟的作品传递出更乐观的人生哲学,既关注了一战后人们对美好过去的怀旧,对现代化城市文明的担忧、焦虑和绝望,更以积极态度肯定了“艺术、自然、宗教、爱、开拓精神等传统价值……当福克纳、菲茨杰拉德与海明威的作品探索终结时,凯瑟作品则关注如何缝补‘破碎的世界’”(孙晓青,2015:39)。伦敦的风景观则经历了从早期的男性主体意识到反对性别二元论,提倡平等的两性关系的转变。他的风景观表明西方传统风景观除了贬低女性,视风景女性化外,还有另外一种建立在积极的社会性别意识文化之上、两性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风景观。

总之,凯瑟和伦敦的风景叙事既真实再现了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变化,揭示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互动和张力,又以作家的敏锐呼吁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民族在尊重自然、善待自然风景的基础上,倡导平等意识、发展意识,构建平等、包容、共同进步的文明社会。

参考文献:

- Baym, Nina. 1981. Melodramas of Beset Manhood: How Theories of American Fiction Exclude Women Authors [J]. *American Quarterly* (2):123-139.
- Campbell, Donna. 2001. Jack London's Allegorical Landscapes: "The God of His Fathers," "The Priestly Prerogative" [J]. *Literature and Belief* (1-2):59-75.
- Dowler, Lorraine, Josephine Carubia and Bonj Szozyguel. 2005. Introduction [G]//Lorraine Dowler, Josephine Carubia and Bonj Szozyguel. *Gender and Landscape: Renegotiating Morality and Spa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Godfrey, Laura Gruber. 2016. *Hemingway's Geographies: Intimacy, Materiality, and Memory*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Henson, Eithne. 2011. *Landscape and Gender in the Novels of Charlotte Bronte, George Eliot and Thomas Hardy: the Body of Nature* [M]. Surrey: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 Jones, Grahame L. 1991. Literary Landscapes: Visiting Homelands That Inspired Three Great American Writers: Jack London's California [N]. <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1991-04-07-tr-215-story.html>.
- Kolodny, Annette. 1984. *The Land Before Her: Fantasy and Experience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s, 1630—1860* [M].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Monk, Janice. 1992. Gender in the Landscape; Expressions of Power and Meaning [G]// Kay Anderson, Fay Gale. *Inventing Places: Studies in Cultural Geography*. Melbourne: Longman Cheshire.
- Quawas, Rula. 2005. Carving an Identity and Forging the Frontier: the Self-reliant Female Hero in Willa Cather's *O Pioneers!* [J]. *Studia Anglica Posnaniensi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41):237-250.
- Rose, Gillian. 1993.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Rosowski, Susan. 1987. Willa Cather and the Fatality of Place: *O Pioneers! My Antonia* and *A Lost Lady* [G]// William E. Mallory, Paul Simpson-Housley. *Geography and Literature: A Meeting of the Disciplines*.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Westling, Louis Hutchings. 1996. *The Green Breast of the New World: Landscape, Gender, and American Fiction* [M]. Athens,

Georgi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陈榕. 2016.《我的安东妮亚》中内布拉斯加边疆景观的国家维度[J]. 外国文学评论(3): 20-40.

丹尼斯·科斯格罗夫. 2009. 景观和欧洲的视觉感——注视自然[G]//凯·安德森,等. 文化地理学手册. 李蕾蕾,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 2017. 了不起的盖茨比[M]. 吴建国,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杰克·伦敦. 2014. 月亮谷[M]. 齐永法,等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戴维·明特. 2009. 杰克·伦敦的写作生涯和流行的话语[G]//萨克文·伯科维奇.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6卷). 张宏杰,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纪秀明. 2021. 想象与抵牾:生态视角中的文学荒野及现代启示[J]. 外国语文(3): 36-42.

孙晓青. 2015. 社会转型时期的审美建构:薇拉·凯瑟的印象主义美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

薇拉·凯瑟. 2006. 波西米亚女郎[M]. 资中筠,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薇拉·凯瑟. 1998. 我的安东妮亚[M]. 周微林,译.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

温迪·J·达比. 2018. 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M]. 张箭飞,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向岚麟,吕斌. 2010. 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文化景观研究进展[J]. 人文地理(6): 7-13.

珍妮·开普尼尔·瑞斯曼. 1997. 杰克·伦敦塑造的新世界的新女性[J]. 马育新,译. 国外文学(2): 31-38.

周峰. 2020. 海明威之“渔”与男性气概[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Gender and Landscape in the Works of Willa Cather and Jack London

LI Li

Abstract: One of the American cultural traditions is the feminization of landscape. It signifies that landscape is the object of the masculine gaze and landscape is to be feminized. The period between the start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1930s witnessed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wilderness to the civilized, from pre-modern to modern society. Willa Cather and Jack London challenged the notion of American traditional landscape. Female characters in Cather's works became the symbol of the Nebraska Prairie. The new kind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landscape is integration and mutual accomplishments. In his later works, London portrayed self-reliant female protagonists, and advocated equal gender relations and human-land relationship. Landscape narratives of both writers are of national significance. Their landscape narratives display the distinctive regional traits and aesthetic features of America. Their common and ideal landscape notion is the harmonious existence between mankind and non-gendered landscape.

Key words: gendered landscape; Willa Cather; Jack London; human-land relationship

责任编辑:李小青